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三三五期 ——
(二〇〇三年四月八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304b)

【广阔天地】插队山西	正 其
【童年旧事】我的文革记忆	笑 蜀
【史海钩沉】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一 丁
【思潮评析】“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	史会来·刘 晓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www.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广阔天地】

插队山西

• 正 其 •

1968年，军宣队进入学校后不久，便开始动员我们这些因为文化革命而毕不了业的在校中学生上山下乡。大会小会开了许多，号召我们“到广阔天地里去炼红心”，“扎根农村改天换地”。

我的好朋友要作为带队的去山西插队。我想了半天——我们看样子都得走，晚走不如早走，这批走还有个好朋友作伴。就报了名。

临走时，学校开了盛大的欢送会，给每个下乡的同学带上大红花，敲锣打鼓地送到火车站。刚开始大家还是有说有笑，渐渐地有人开始掉泪，最后火车启动驶离北京时，整列火车一片哭声。就这样，我们在一车哭声中离开了北京，踏上了插队落户当农民的道路。

我们去的是山西省天镇县。刚到时，县知青办公室主任老谭介绍说，天镇天镇——你听这名就知道我们这是天下第一镇。甚么天下第一？他没说明。以后我才知道是天下第一穷，至少在山西是最穷的一县。这个县从地图上看，是在山西省最北边的尖尖上。地处河北内蒙山西三省

交界处。离北京倒不算远，也就500里路。按当时的票价，花5块钱，坐5个小时火车就到北京了。如果坐慢车，只需4块钱就行了。这对我们来说，以后成了最大的优点——回家方便。

这个天镇县，整个来看，象一个盆地。四周是挺高的山。北边的山上趴着逶迤蜿蜒断断续续的长城。这里的长城不是砖的，是土的。山下来便是广大的，长长的坡地。县城位于盆地的最低处。这县城大概是天下第一的小，只有一个十字路口，却也有一圈断断续续土垒的城墙。这地方的建筑物多数是土垒的。县城里还可以看到砖砌的房屋，村子里的房子几乎全是土坯的。我落户的那个村子里，只有大队部盖了一排砖房，腾了出来给我们21个北京知识青年们住。由此看来，大队待我们还是挺厚的。老乡们住在土里——土墙土地土炕土灶台。

我去的大队，叫谷前堡公社谷后堡大队。从此以后我给家里和同学写信就要署上这长长的地名——山西省天镇县谷前堡公社谷后堡大队。

我们住的这个村子地处坡地上，离县城十多里路，离铁路线也就两里路。在全县比起来算较好较富裕的一村。这可能是沾了我那好朋友的光，因为她是全校带队的，县知青办公室自然要照顾一点。其他同学有的去了挺偏僻的山里。有几个同学去了一个山村叫李家庄。县知青办主任老谭送他们走时说：“李家庄子，山清水秀！”过了几个月，老谭在县城碰到了这几个同学，问道：“哪个村的？——李家庄子？——穷山恶水呀！”这几个同学恨不得想上去揍他一顿。

我们这个大队虽说在全县比起来算好的地方，可也是赤贫大队。虽然靠近铁路，离县城也不远，可那年月不允许搞副业，不许种果树，只许种粮食。要“农业学大寨，大寨在山西，山西怎么办？”“备战备荒为人民！”这地方冬天冷到零下30多度，主要粮食作物是小米、玉米和土豆。老百姓叫土豆是“山药蛋”，又当粮又当菜。玉米和土豆只能种在少量的滩地里，大多数的坡地上只能种小米。小米就是谷子，产量很低，亩产也就二百斤。这里的人虽然住在土里，种的地里可不全是土。坡地里沙石比土还多，尽是拳头大的鹅卵石。老乡们自嘲地说，这是地骨头，没它就没人。这样的地其实适合种果树。据说前几年有个大队长带人种了几棵苹果树，上边不允许，砍了苹果树，撤了大队长。

这里粮食产量低，老百姓的口粮当然就少，少得可怕——一年人均口粮273斤。而且是原粮，小米是包括其外的包皮——谷糠，算在内的。而当地人的主要食品，就是喝糠糊糊。这糠糊糊就是用小米和谷糠加上土豆一起煮成的稀粥。如果谁家的稀粥里没有糠，那就是过节了。玉米面蒸成的饼子，是稀罕的食物，给干重活的人吃的。喝完这样的糠糊糊下地干活，撒两泡尿就又饿了。所以当地人干起活来懒洋洋的。下地钟敲完了半个钟头，人们才三三两两地到钟下集合，慢慢地走到地头，便蹲在地头休息休息，他们叫作“屹蹴屹蹴”。然后再干活。干会儿活再屹蹴屹蹴。干半天总要屹蹴两三次。人混地，地混人。活着而已。

就这样成年处于饥饿状态，每年秋收后他们还是照样得交公粮，交完公粮才能分社员们的吃粮。看他们交公粮时，我想，这些农民真了不起，自己饿着肚子把粮食送给别人吃。什么叫逆来顺受，在这里我体会得最深。无论上边让干什么，他们都是默默地执行。

让搞阶级斗争，就每天晚上凑到队部里，找出个祖爷爷是富农的小子，唏哩哈啦地批斗批斗。看不出什么阶级仇恨。凑在一起逗乐子。让“深挖洞，广积粮”，就在村子旁边挖防空洞。洞子挖了一人多深，沙石的土质就开始塌方。还听说别的村有塌方砸死人了。于是便扔下不了了之了。

吃饭没有粮食，也没多少副食。很少吃肉，食油是菜子油加胡麻油，一年人均2两。他们吃菜都是土豆和洋白菜什么的煮一锅，最后淋上几滴油。每年分油时，村子里比过年还要喜庆。

老乡们见了那种，我们闻着总觉得是怪味道的胡麻油，喜欢得要命。有的脸皮厚的后生，趁分油的不注意，拿起油斗子，大口大口地喝他几口。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我们21个知青被分到了4个小队里。我们小队让女知青跟女社员们一起干活。当地的风俗是女人结了婚，就不下地干活了。而姑娘们不到18岁早早地就嫁出去了。所以我们是和一些小姑娘们一起干活。这些小姑娘从小营养不良，长得都象干乾瘪瘪的豆芽菜，面色灰黄。那里的姑娘们出嫁，要收很重的财礼。爹娘象卖女儿一样要收婆家的钱。能要多少，主要看女儿长得如何。而评价这女儿漂亮不漂亮，可不是象现在的城市姑娘以瘦以苗条为美。那是实实在在地以高以胖为美。简直是按斤作价，象卖猪肉。

我们小队的姑娘，最高最胖的是名叫改云的16岁女孩儿。大家公认她可卖500块钱。你猜她有多高多胖？个头也就一米五，体重有80斤就不错了。

下地干活时，小姑娘们嘴动得比手动得欢。常说的就是谁谁嫁到了哪里，谁谁嫁了多少钱。再一个常说的话，就是吃。这个说，她最爱吃玉米饼子。那个说，她最爱喝净小米的稀粥。精神会餐，给嘴过过瘾，最高的想象程度，也超不过玉米饼子小米粥。有一次她们问我最喜欢吃什么。我随口说，最爱吃馒头。她们很惊奇地问，什么是馒头？于是，我费了半天口舌，来说明什么是馒头。最后，也没让她们明白。

吃的是这样，穿的呢？一般人都是冬天一身棉，里边没衬衣，光板子穿着过一冬天。夏天一身单，晚上洗了白天穿。这里的冬天和内蒙差不多，经常是零下二三十度。外出和下地的人穿老羊皮袄，毛朝里，光板朝外，灰白色的，没有布面。一群人走在一起，活象一群老山羊。国家发的布票，没钱买布，拿到集市上偷偷地卖掉。女人用的月经带是缝个布袋袋，里面装上沙子，每日换沙子不换布袋。生了孩子也是放在沙布袋上，尿了，换换沙子。

贫穷，可怕的贫穷，而且是整体的贫穷，而且是在“穷苦人翻身得解放”后的20年。

我们这些知识青年，刚去的第一年，还没怎么挨饿。因为第一年吃国家拨给的每人540斤粮。第二年就跟社员们一起分粮吃了。那可真叫饿！好在离北京近，大家找出各种借口，请假探亲。然后大包小包地背回各种吃食。不久，知青点里闹开了老鼠。连老鼠都知道知识青年那里有好吃的。大白天的，耗子都敢满屋乱窜。可能这些耗子饿疯了，见到吃的，连人都不怕了。春天大队干部给了我们一些杀鼠药，放在屋里。这些老鼠吃了杀鼠药，却钻到最深最黑的炕洞深处去死，掏也掏不出来。因此整个夏天我们的屋里都弥漫着一股尸臭味。大家久居其间，果然不闻其臭。出来进去的，吃饭睡觉相安无事。

再后来，很多人冬天干脆跑回北京，一呆就是半年。我在下去的第三年时离开了那里，随后的几年里，知青们陆陆续续地离开了，直到一个不剩。那些在土里生活，在沙里干活的老乡们，仍然祖祖辈辈地呆在那里。

三十余年过去了，这些记忆中的东西，象石块一样沉重地压在心里，不吐不快。现在，中国的口号是，全民奔小康。要真能让全国农民都过上小康日子，可太好了。

我曾经相处过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现在小康了吗？

□ 寄自美国

~~~~~

【童年旧事】

## 我的文革记忆

• 笑 蜀 •

### 一

我母亲是乡村教师。经常搬家——从一个村小搬到另一个村小。我的记忆，就从一次搬家开始。那天，母亲把我交给一个农民照看，自己撑着一把破伞去整理校舍。那时我也就四岁左右吧，第一次离开母亲，望着瓢泼大雨哇哇的哭了好长时间。

次日入驻新校舍——其实不过是一个破庙，墙壁统统是竹篱糊泥巴。没有电，晚上只能点煤油灯。而且煤油是定量供应，量很少的，远不够用。所以每天都是早早地吃了晚饭，就上床睡觉。

那时我的印象中只有母亲，父亲也是乡村教师，但不跟母亲在一起，而在很远很远的地方，后来才知道那时他在上“学习班”，跪过瓦子。

母亲也常常不在家——运动初期停课闹革命，母亲的使命只是到乡小参加批斗大会，既斗人，也被斗。几个小孩子没人照看。每天到了黄昏就站在门前的石桥上朝远远的山影喊“妈妈”。一边喊一边想象妈妈应该走到那个山坡哪个路口了，可就是不见妈妈的回音，于是喊着喊着就哭了起来，边哭边喊。

终于恢复上课了。我也到了入学年龄。我却不能入学。因为母亲教的是高年级，一年级是一个民办老师教。那位民办老师跟母亲关系不太好，就找了个理由把我拒之门外——我是地主子女，社会主义学校没我的位置。

就这样我成了无业游民。天天在学校操场上玩泥巴。那时到处都是标语口号，学校的墙壁贴满了《最高指示》。学生在课堂里读的也是《最高指示》。天天听学生朗读，我竟然把那些《最高指示》差不多倒背如流。下课时就问学生，哪条最高指示贴在哪。我毕竟是老师的孩子，学生们都乐意给我指出。然后我按照自己的记忆一条标语一条标语的念，掌握了很多汉字。一个秋日的早上——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坐在门前的草地上念报纸。正好那位民办老师路过，他见我念的有滋有味，好奇地探头来看，不禁吃了一惊——一大篇文章我竟然没读错几个字。

当天他找到我母亲，要收我到他的班上就读。这时我已经不能也没必要从一年级读起了。于是当了插班生。

那个老师后来对我一直非常好非常好。考上大学后，我走了五十多里的山路去看望他。

### 二

大概是从1969年起，局势渐渐稳定了，父亲也能在寒暑假回家了。父亲给我的最初印象一点都不美妙。他总是板着脸，似乎这辈子压根就不会笑。他晚年解释，那时他在血泊中讨饭吃，哪笑得起来。

虽然在血泊中讨饭吃，但跟周围农民比较，我们家简直就是贵族。因为我们家是吃商品粮的——“吃商品粮的”在当时的农村中最让人羡慕，许多农民最大的梦想就是能供出一两个吃商品粮的孩子。虽然家庭出身所限——地主子女——我们几姊妹政治上一直抬不起头，

但“吃商品粮的”这个特殊身份，多少给了我们几姊妹一点自尊，一点安慰。

所谓“吃商品粮”，即几乎一切消费品都纳入定额分配。我记得教师的粮食定额是每月32斤，小孩子根据年龄各有不同。至于肉、食油、煤炭、鸡蛋乃至洗衣粉、火柴等等，则无论成人小孩，一律均等。肉是每人每月一斤，食油每人每月4两。所以，那时每一次吃肉都是过节。饭桌子上舍不得吃，就藏进衣服口袋里。小孩尤其是男孩的衣服口袋哪有乾净的。等到过后拿出来，肉片上面都沾满了尘土。但仍然视若珍宝地小心翼翼地品尝着。定额微不足道，到了非常时期，比如家中有了病人，就只能通过非常渠道来解决。那时不许有集市，甚至农民的自留地都要当做“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买卖双方都不敢到镇上交易，农民背着背篋，在路口上等，碰到衣着稍稍整洁的，似乎有“购买力”的行人，就悄悄问一声：“要肉吗？”“要蛋吗？”上小学五年级时，我曾经到这样的“非常渠道”买过几次肉。后来母亲病重，医生诊断是贫血，需要赶紧补充营养。母亲破天荒地每天吃一个鸡蛋。母亲吃蛋的时候，我在饭桌子上看得眼巴巴的，直咽口水。

“吃商品粮的”尚且如此，农民更不用说。我家邻居就是农民，隔墙开个16开大小的孔，供两家借送物品之用。到了收获红薯的季节，从壁孔递来递去的都是饭碗——农民一年到头总是吃粗粮，很难吃上白米饭。他们家的小孩这时就用红薯饭来换我们家的白米饭。74—75年当地闹饥荒，饿病了的农民统统集中到公社大院里治疗——药品就是白米饭加糖。常常有很多农民甚至是“吃商品粮的”出走，据说似乎有一种约定，每到半夜，就有神秘的“红车子”开到三叉路口等着，要出走的人就在这赶来上车，一车一车的四川人就这样拉到遥远的新疆，在那里安身立命。

### 三

文革给我的记忆当然不只是物质上的饥谨。

八亿人民八个戏，这是现在的人们概括当年精神匮乏常用的一句话。但事实上，当年我们有八个戏看，已经不容易了。小时看电影，主要看露天电影。每当银幕在学校操场挂起，都要在山村里引起一场小小的骚动，农民们奔走相告。天还没黑，便络绎不绝地赶来。那是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也是我们小孩最神往的。一般是新闻记录片开头，内容无非是国家领导人的外事活动，和各地的大好形势；跟现在的新闻联播没多少区别。然后就是样板戏或者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放来放去的就那么几部，但还是百看不厌——隔几个月才有一次，再烂的片子也不觉得烂了。更何况根本没看过好片子，根本没鉴赏力可言。有的看就足够了。

其次是广播。先是无线“广播”。文革最初几年，每天清晨总有人拿着铁皮喇叭筒跑到山顶，扯足了嗓子喊“最高指示”。这事我自己都干过，虽然那时我不过七八岁。后来有了有线广播，广播内容不再局限于“最高指示”，样板戏、革命歌曲、会议通知、书记讲话乃至是骂娘等等，应有尽有。到广播站工作是一件很神气的事，可说是百里挑一。广播站因此简直成了俊男俏女集中营，颇多绯闻。县广播站就发生过几起案子。某女播跟站长勾搭成奸。女播的丈夫是营级军官，回家探亲时碰巧撞破了天机。上演一场全武行，营级军官当场毙命。还有一位女播，死在宿舍很多天才被发现，尸体已经恶臭。侦破结果，是有人半夜翻窗而入，将女播奸杀。

再次是巡回演出。有军队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也有地方组织的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地方宣传队一般由中小学师生组成。我的两个姐姐和我本人都是宣传队骨干。内容有歌舞，有快板，有三句半，有相声。歌舞动作，最常见的是腿成弓箭，双手八字敞开。比较活泼的歌舞，我印象中只有一曲“大寨真是雅克西”，我领唱，装成新疆老头儿，带一群“铁姑娘”蹦蹦去。那歌儿忽而高八度忽而低八度。我的音域太窄，到了高八度就卡壳，常常惹的台下一片哄笑。

那时我们很喜欢演出，不仅是因为热闹，不仅是因为自己可以神气一番，更重要的诱因在于，演出必有加餐：面条、包子等等。这些现在的孩子看来再平常不过，而在儿时的我们看来是地道的美味佳肴。

跟现在比照最鲜明的，当然是读书生活。那时的孩子没什么书可读，每学期新教材一下来，都赶紧从头翻到尾。这教材便是那时孩子们的主要读物了。而其内容，无非是流行的政治时文。有人形容我们“学唱的第一首歌是东方红，学说的第一句话是毛主席万岁”，这个概括还真是一点没错。甚至数学题也由政治时文构成。加法是大好形势：今年和去年一共丰收多少，减法也是大好形势：今年比去年增产多少。

我出身“书香门第”，条件比同龄人好一些，读的书稍多一些。父亲跟一家人团聚后，给我们订了一份《解放军文艺》，杂志一到，几姊妹都要抢着看。父亲比较宠爱我，所以我常常抢得先机，令姐姐、弟弟们欣羡不已。姐姐从外面偷偷地借回一些文革前出版的小说，比如安徒生童话，比如青春之歌。她担心“毒害”我，总是不让我知道。但我总是能够发现。等到姐姐出门了，就满屋子翻，抽屉里，枕头下，总有收获。即便翻出的只是零碎的残页，也要如饥似渴地反复咀嚼。后来年龄大一点，自己也有办法从外面弄到书，于是走路在看书，吃饭在看书。晚上等全家人都睡了，再悄悄爬起来，点燃早准备好的煤油灯，躲在蚊帐里看书。上五年级时，在课堂上看《保卫延安》，书被老师没收了。当时真是痛心疾首，绞尽脑汁要把书弄回来。终于想出个办法，写了篇批判《保卫延安》的小文章交给老师（因为当时官方定调，《保卫延安》是坏小说），表示自己的认识已经提高，已经在用实际行动改正错误。

因为读的书稍多一点，见识也就比同龄人多一点。同伴们在一起聊天，大多只能讲黄色笑话，黄色故事。当然都是从成人那儿拣的。我却可以把他们带入安徒生的世界，格林的世界，张乐平的世界，刘备张飞诸葛亮的世界。而我的那些世界，对他们无疑极具震撼力。所以，虽然小孩总爱恃强凌弱，而我自小就体格羸弱，但同伴们很少欺负我，反倒很敬重我、佩服我。

我们的童年，真是苦中求乐的童年。不知苦，焉知乐。现在的孩子，没有那样的经历，所以很难有那样的状态。每次逛书店，看到五彩缤纷的少儿读物，总不免感慨——现在的孩子真幸福。可现在虽有这么多的书可以选择，爱读书的孩子却并不多。电子游戏、航模、车模等等，光怪陆离的外部世界，耗费了他们大部份的注意力。他们根本没有我们儿时那种精神上的饥饿感，根本没有我们儿时那种强烈的精神上的进食欲。

这时候想想就觉得：也许童年之苦，对我们还不完全是坏事。

~~~~~

【史海钩沉】

试析河南省文革的几个特点

• 一 丁 •

在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每个地区、每个单位乃至每个人的历史都有相似之处，却又不尽相同。近几年来，我翻阅大量资料，访问了许多同志，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进行了回顾与思考，我觉得和其它省相比，河南省的文化大革命有几个显著的、鲜明的特点。现将这些也许不太成熟的、不太确切的看法谈一下，以供历史学者和文革研究者参考。

一九六六年八月，在毛泽东写出《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十三天后，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也写出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带头支持郑州大学少数造反学生，此举带动了河南一大批领导干部挺身而出，坚决支持造反派。这批老干部后来参加了各级“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掌握河南省的党政领导大权达十年之久。这是河南省文革的特点之一。

一九六六年八月十四日下午，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刚闭幕，参加会议的刘建勋在北京前门饭店接见赴京反映河南文革情况的郑州大学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三位学生，并明确地讲：“回到河南后，要在郑州召开一、二十万人的群众大会，号召大家炮打省委司令部，首先炮轰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五日，刘建勋和党言川等三位同学一起离京返郑，在火车上，刘建勋又围绕“敢于革命，善于革命，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十六个字，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鼓励青年学生搞好文化大革命。回到河南后，刘建勋在地市委书记会议上提出“炮打司令部”，并动员学生炮打“我这个司令官”。八月十九日，刘建勋在郑州大学宣读了《我的一张大字报》，公开表态支持因给校党委、工作组提意见被压制、围攻的学生党言川及河南省第一个大学造反派组织——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对于刘建勋的大字报，在河南一开始就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看法，以后还成为河南两派辩论的焦点。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央政治局工作汇报会上表扬刘建勋和这张大字报，说：“全国只有刘建勋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少数派，这是好的。”事实证明，刘建勋的这张大字报，对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产生了影响是巨大的，也是符合毛泽东的意图的。

一九六六年八、九月份，北京学生到全国各地串联，煽风点火，不少省份出现围攻、殴打北京串联学生的事件，大抓“南下一小撮”，而河南省委却在九月二日发出了《关于欢迎北京学生进行革命串连的通知》。刘建勋的这些举动，带动了全省地市县大批领导干部表态支持少数派，并使河南省的文化革命运动沿着《十六条》的方向健康发展。从六六年八月到六七年元月，河南省的学校、工厂、机关造反派组织相继成立，并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和“炮打司令部”中成长壮大，由少数成为多数。河南省军区的介入使这个局面被打破。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在67年2月10日给中央文革小组的信中说“河南郑州市各大专院校，无产阶级革命派原早已取得绝对优势，但自元月中旬起即开始分裂为两大派，在元月三十日河南省军区和人民解放军驻郑部队举行了游行之后，斗争即转移为以军区为中心展开了，一派支持军区，军区和另一派则处于对立，斗争十分尖锐。工人、农民、机关干部也参加了。不仅郑州市如此，据说开封等地也有类似情形。我认为斗争锋芒应该是对向省、市委，但目前不是这样的。”文敏生的信说出了河南省当时的真实情况。

一九六七年元月，上海“一月革命”风暴席卷全国。一月十二日，河南省委领导纪登奎、戴苏理、王维群召开省委文革各办公室主任会议，动员迎接革命造反派大联合、大夺权的风暴。纪登奎说，要迎接大高潮，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要一边倒。这期间，郑州大中学校造反派在夺权问题上开始分裂。郑州工学院革命造反派等少数造反派主张先揭发斗争文、纪、戴、王（黎之，郑州第一书记），并把他们看管起来。而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等多数造反派则要联合起来，先夺省委文革小组的领导权，再揭发批判。一月十八日晚，文敏生在粮食学院召开常委会，会议决定：1、在文、纪、戴被红卫兵看管起来的情况下，由王维群、李庆伟、王庭栋负责坚持工作。2、如果郑大联委等革命造反派要夺省委文革小组的权，坚决支持。“革命造反派夺权，坚决支持，保守派夺权，坚持顶住。”

一月二十三日，中央发布“关于人民解放军坚决支持革命左派群众的决定。”要求人民解放军坚决站在无产阶级革命派一边，积极支持广大革命左派群众的夺权斗争。河南军区正式介入地方文化大革命后，公开支持郑州工学院少数造反派联合成立的“河南省革命造反派总指挥部”（简称“河南造总”）和重新崛起的保守组织——“十大总部”；公开反对郑大联委、开封“八·二

四”、郑州国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等造反派组织。在干部问题上把刘建勋、纪登奎定为走资派并上报武汉军区党委。这时候，刘建勋已调到北京市委工作，曾跟着刘建勋支持造反派的大多数领导干部采取观望等待的态度，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曾带领人到军区找第二政委何运洪为学生说话，但何运洪拒不接见。六七年二月七日，郑大联委、河医东方红、粮院联委、予农红总、郑大附中红旗、六厂工人赤卫队、郑印八一、新乡八一八、洛阳八一六等全省七十四个造反派组织联合成立了“河南二七公社”。军区不仅不承认二七公社，还实行种种镇压、摧跨政策。三月六日，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在大会上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予以取缔。四月二十日，中央广播电台传来刘建勋参加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消息，二七公社派欢欣鼓舞，坚信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而“河南造总”和“十大总部”却在军区支持下，一方面由“省委造总”出面主持，连续组织部长以上的干部召开批斗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大会，运动初期已经靠边站的赵文甫、杨尉屏也应邀参加了大会。另一方面派人到北京揪刘建勋，给中央施加压力。

一九六七年二月，周总理传达毛主席的指示，说：“河南两派闹的很厉害，要他们双方到北京谈判，包括军队认为是反革命的那些人也要派代表来谈话，谈一谈就情楚了，实际上被认为是反革命的，恰恰是革命的，弄颠倒了。”根据毛主席的这一指示，一九六七年五月中央召集河南省三方（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为一方，河南造总为一方，十大总部为一方）到北京谈判。5月11日，原省委书记处书记戴苏理公开表态支持“河南造总”，坚决和河造总“团结在一起，战斗在一起，胜利在一起”，并代表河造总一方去北京参加谈判。而支持二七的领导干部，由于高压控制无法表明态度。为了争取领导干部在高压下站出来对二七公社的公开支持，5月15日，二七公社“豫农红总”一些学生把省委付秘书长张跃东“抢”到农学院，他经过调查了解后，张跃东发表了“对目前形势的看法”，表示支持二七公社。5月17日，“豫农红总”又和郑大附中“红旗”一起把刚刚被批斗送回住处的纪登奎“抢”到农学院保护起来。十九日夜，纪登奎化妆成铁路工人被二七公社派人乘拉煤的火车护送到北京参加三方谈判。接着，新乡第一书记耿其昌也被新乡师院八一八的学生护送到北京。在这种情况下，省委一些领导干部纷纷发表声明支持二七。5月25日，郑州市市委书记王黎之；5月29日，省委付秘书长苗化铭；5月31日，省公安厅副厅长高大同，接着省委书记处书记、副省长王维群、省委副秘书长王庭栋以及李剑波、董连池等厅局长以上的干部相继表态亮相。从五月到七月，有近四百名地、市、县以上领导干部来到被称为二七公社“解放区”的河南农学院，探听北京消息，支持二七公社，享受一条毯子、一条席、一个馍、一碗菜的待遇。这些待遇曾作为他们较早支持二七的“资本”被炫耀过。据一份1967年8月“省委机关干部亮相情况”资料表明，原省委机关厅局级以上干部共47人，7月25日以前公开亮相支持二七公社的23人，占此级干部的49%；同情二七公社的2人，占4.25%；中间状态1人占2.12%；支持河造总的15人，占32%；支持十大部的6人，占12.7%；7月25日中央表态后，又有部份领导改变态度支持二七公社。

一九六七年七月五日，在周恩来亲自主持、中央其他领导亲自参加下，河南省三方赴京汇报团达成了停止武斗的六项协议，7月10日，中央发出了解决河南问题的（67）216号文件。文件中指出：（1）河南省军区在支左中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2）河南省党内走资派是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书记处书记赵文甫；（3）刘建勋是革命领导干部，并回河南筹备河南省革委会。1967年7月25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新华社提供的关于全国各地对武汉“7·20”事件反映的综合报导，在这篇报导中，首次使用了“二七公社是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字眼。当天的《人民日报》也在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了这条消息。这就是在河南被称为的中央“七、二五”表态。“七、二五”后，刘建勋从北京调回河南。（刘建勋于1966年9月1日调到北京任华北局书记、北京市委常务书记），8月2日，中央批准成立河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刘建勋任组长，王新、纪登奎任副组长。在省革筹的领导下，按照毛主席“帮助、批评、联合”的指示，实现了“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和“河南造总”的大联合。到19

68年初，全省百分之七十左右的领导干部被解放出来，相当一部份参加了“三结合”。省直机关六十六个单位，共有厅局长以上干部393人，已解放284人，占72%，其中第一把手31人。1968年元月27日。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刘建勋任主任，王新、纪登奎、耿起昌、杨力勇任副主任。革命群众代表1—2名副主任暂缺。由“暂缺”群众组织代表可以看出刘建勋并没有把“浴血奋战”支持他的二七公社派扶到省革委副主任的位置上（据资料：省级革委会里群众组织代表担任副主任职务的：湖北省3人，其中学生1人；陕西省7人，其中学生3人；四川省9人，其中学生2人；湖南省2人，其中学生1人）。据河南省地（市）县77个革委会统计、其中有48个革委会付主任群众代表空缺。学生头头担任县革委付主任职务的只有4个县。

河南省革委会成立后，除了军队干部变动和纪登奎调到中央工作外，直到1978年，河南省的核心领导，包括地市委书记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也就是说河南省十年文革中党政领导权都掌握在以刘建勋为首的老干部手中。这批老干部坚持党性，坚持“老中青”三结合的组织原则，坚持抓革命促生产，使河南省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据资料，文革期间，全国23个省，其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长速度前八名排列结果：第一名中河南占三个；第二名河南占三个，六项指标河南均在前两名，高于全国平均增长水平。70年7月，焦枝铁路建成通车，其中河南区段以投资小、见效快受到国务院的表扬；70年11月，河南省开始筹建年产70万吨特种钢的舞阳钢铁厂，78年一次试产成功，结束了中国不能生产特种轧钢的历史；闻名世界的河南林县红旗渠，也是在文革期间峻工的。

二

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第二个特点是造反派不仅参加了“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后来还被提拔充实到各级领导班子，即所谓“河南造反派掌了权”。

1968年元月，河南省革命委员会成立时的四十名常委中，有二七公社代表14人（包括工人、干部、学生），开封八二四代表3人，其中大中学校造反派头头8人，他们是：党言川（郑大联委）、陈红兵（开封八、二四）、周启忠（粮院联委）、范念民（豫农红总）、杨国雄（河医东方红）、黄宗万（新乡师院八一八）、丁素琴（中医学院八、三一，属“河造总”代表）、王传玉（郑大附中红旗）。1968年以后，随着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兴起和大中学校学生分配，这些红卫兵头头也毫不例外地到工厂、农村、解放军农场或基层单位接受再教育，他们的“常委”头衔，除了偶尔去参加一次会议外，只是挂个虚名而已。即使省革委刚刚成立，他们最“红”的那段时间，除了开会，就是跟随刘建勋、纪登奎等老干部到造反派分裂或武斗严重的地市解决派性和大联合问题。1971年再教育结束后，他们重新分配到工厂、学校担任教师或搞技术工作。1973年，在各级党组织和政府职能部门的恢复建全中，根据中央“吐故纳新”“老中青”三结合的指示，河南省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干部，大多数是文革中的“二七公社”派，也有“河造总”和“十大总部”派的。党言川、陈红兵、周启忠、杨国雄、范念民、黄宗万等学生头头均被任命为县委副书记兼公社党委书记。其它各个行业的头头也相应提拔到所在的工厂、企业、机关、学校领导班子中，任副书记、副厂长、副主任、副部长、副校长等职。上行下效，农村到大队、工厂到车间班组都不例外。河南的这种做法，是全国大势所趋，如王洪文被提拔到党中央副主席位置上就是一个见证。是否河南省在提拔青年干部数量上高于其他省份呢？答案是：否。据义愤资料表明，河南省从1967年到1976年发展党员十万六千人，在全国仅排第十位。

河南省所提拔的造反派干部是如何“掌权”的呢？事实是他们“掌权”后，大都在基层单位领着工人学大庆，领着农民学大寨，兢兢业业、以身作则，贪污受贿者甚少。以河南省几个学生头头为例，在任县委副书记、公社书记期间，都做了这样几件事：一是积极参加和领导本

单位的批林批孔运动；二是为本公社办企业奔波；三是带领群众学大寨平整土地，学林县兴修水利；四是积极推广农业新技术，如间作套种、玉米制种等。总之，他们一心扑在工作上，真正做到了“为官一任，造福一方”。1978年，当陈红兵因“文革罪”被捕判刑20年后，他的爱人从原阳县搬家时，当了五年县委副书记和公社第一书记的他其全部家当是几个纸箱和一个老掉牙的柜子。这与当今的“县太爷”相比，岂不是天壤之别！

还有一点应当指出，河南省提拔的新干部绝大部份是副职。正职大都由老干部担任，由于这些老同志在文革中支持过造反派，参加过“三结合”，所以对于新干部，他们不仅有提拔和重用的权利，也有批评和帮助资格。在“形势需要”时，还可能“收拾”一下。1975年，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纪登奎来到河南把一些造反派骂成“不是好东西”“四大金刚”“八大赖”就是典型的例子。在次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一些被点名批评的造反派又反击了刘建勋及个别地市委书记。随着毛主席的去世，河南省新老干部的这些恩恩怨怨，自然烟消云散了。

三

一九六六年九月，以党言川为首的郑大联委首次批斗“走资派”，是从揭批原河南省委1958—1961年在河南搞“左”倾蛮干、大刮“五风”，实行高指标、高征购、高估产的错误政策，造成骇人听闻的“信阳事件”入手的。这是河南文革的第三个特点。

提起党言川，四十五岁以上的河南人很少有人不知道。对于他的响当当的名气，众说纷纭。有人说是刘建勋的一张大字报捧起来的；有人说是何运洪（省军区第二政委）“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撒出来的，有人说是“老保”骂出来的……总之，党言川在河南省文化大革命中名气之大，影响之广，可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

党言川究竟何许人也？许多人当时并不完全知道。亦曾发生过许多笑话。如有一次，郑州一位学生回家，老人们郑重其事对她说，你可不要跟着党言川跑，他是刘建勋的小老婆，名声太坏，咱可丢不起那人，当这个同学说党言川是个男生时，大家都笑了。其实，党言川当时是郑州大学中文系四年级的学生。

文化革命一开始，郑州大学就成了河南省文化革命的焦点，也是全国起来造反最早的四所大学（其它三所是北京大学、南京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之一。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送了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当天晚上，郑大中文系一年级学生王相海等十四位学生贴出了全校第一张大字报。大字报批评了校党委压制群众运动，单批学术权威，把郑大运动搞得“死气沉沉、冷冷清清，不像样子”。当天夜里，郑大党委召开会议准备组织反击。六月三日，全校性的反击开始了。写大字报的学生被打成“小邓拓”“小吴晗”“反革命”“小右派”“牛鬼蛇神”。据不完全统计，当时郑州大学被打成反革命的有174人，一些保党委的人贴出了“郑大不是北大”“反对校党委就是反党”等大字报，郑大校园内呈现一片恐怖气氛。六月六日凌晨，中文系一年级学生、共产党员、转业军人、团支部书记王相海跳楼自杀身亡；当天下午，省委工作组进驻郑大。工作组进驻后，继续压制运动，挑动学生斗学生。六月七日晚，党言川同学因同意王相海的大字报观点被斗争。六月十八日，党言川率先贴出声讨工作组巨幅标语。八月一日至三日，中文系学生方复山、刘松盛写出了长篇大字报《致党中央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指出中共河南省委及其驻郑大工作组犯了严重错误。同日，党言川等九人贴出了《彻底揭发批判省委和省委工作组执行的右倾路线》的大字报，而另部份学生则贴出了《河南省委驻郑大工作组正是体现了党的正确领导》《否定工作组，实质上是否定党的领导》等针锋相对的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是阴谋家、野心家”等。八月六日，党言川第一个上北京，向毛主席党中央汇报河南和郑州大学文革情况，接着方复山、刘松盛二同学也去到北京。

三个学生联名发表《致北京革命学生的公开信》，系统地向首都人民说明河南文化大革命存在的问题，同时向国务院接待站作了汇报。为此，正在北京开会的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专门接见了他们，主动地承担了河南问题的责任，明确表示要按照党中央决定搞好河南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八月十五日，党言川、方复山、刘松盛和刘建勋一同离京返郑。当天晚上，他们串联部份同学筹备成立“郑州大学文化革命联络委员会”（简称郑大联委），并组织召开了“赴京情况汇报大会”，郑州市其它大中学校的师生和各界群众参加了大会。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和其他领导也来到会场。会议开始前，由于校文革负责人要求主持会议，双方发生争执，被联委同学赶下台去。会上党言川等把北京的“红卫兵”“革命大串联”“炮打司令部”等新鲜事物介绍给与会群众，并宣传了《十六条》精神。十五日晚上和十六日上午，校文革主持召开“郑州大学革命师生辩论会”，会上称党言川的汇报会是“黑会”，“打了校文革的人”，于是一些不明真相的群众呼出“控诉党言川一伙殴打校文革的法西斯暴行”、“打倒党言川”、“把党言川揪出来”的口号。接着是连续三天的对党言川及联委同学的围攻斗争。八月十八日，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书记处候补书记纪登奎、戴苏理来到郑州大学与两派代表见面，召开座谈会，听取意见。八月十九日，刘建勋、纪登奎等又到郑大，召开了郑州大学全体师生员工大会，会上宣读了刘建勋《我的一张大字报》。大字报中说：党言川等三位同学到北京找党中央、毛主席要求汇报郑大文化革命情况，这不仅不是什么非法行为，而是一种革命行动；他们回校后召开的“赴京情况汇报会”不是什么“黑会”，而是光明正大的革命大会；郑大部份同学认为本校的文革会，不能代表他们的意见，因而自动酝酿成立联委会，他们起来闹革命，我认为不能说是非法的……。大字报共十条，不仅旗帜鲜明地支持党言川等少数派，而且按照十六条精神号召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刘建勋的大字报使郑州大学的少数派欢欣鼓舞，队伍迅速壮大。八月二十一日，郑大联委“正式成立。九月三日，联委发出《火急呼吁书》吹响了炮打省委司令部的进军号。呼吁书中这样写到：“多少年来，河南省搞的很不像样子，五千万河南人民被穷白两座大山压得喘不过气来，尤其是在1958年以来，出现了一系列极其严重的问题和骇人听闻的反革命事件，这些事件，必须彻底追查清楚，坚决地把根子挖出来！……”九月四日，联委成立了“专揪吴芝圃战斗队”，派人专程去广州揪吴芝圃。九月五日，在郑州市体育场组织召开了河南省首次“省会各界革命群众炮打省委司令部黑线煽风点火大会”，来自郑州、开封、新乡、洛阳、许昌等地一百多个单位的工人、农民、干部学生及外地来郑串联的师生五万多人参加了大会。大会发言中在次提到河南省1959年大刮“五风”及“信阳事件”问题。九月十一日，郑大联委第二次主持召开“省会各方革命群众炮打河南省委黑线煽风点火大会”，会上给省委副书记、副省长赵××挂上“历史反革命”的牌子（这在河南省文革中尚属首次），引起了在场的纪登奎、张耀东的不满。纪登奎当场质问大会主席，你们说赵××是历史反革命有什么根据？其实，这里指的正是一九五九年前后，河南大搞浮夸风，高估产，高征购，造成数十万人饿死的这段悲惨历史！党言川等人所以能一呼百应，数万人起来批斗省委领导赵××（当时吴芝圃已不在河南）正是基于这个背景。从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以下两件事可以说明。

六六年八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说：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吴芝圃，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另一件事是六六年八月在新乡师范学院担任工作组组长的丁×得到了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给新乡师院同学的一封信。信中说：“你在第一封信中谈到你的学习心得和你对农村58—59年情况的看法，我完全同意你的意见。追根求源是我们党中央在哪几年犯了不小的‘左’倾错误，其次在于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缺乏经验，以及敌人的蓄意破坏有关。三面红旗，现在我们的党中央还想竭力地举起来，但是三面红旗中的两面已在很多人中失去了

号召力，不用说工人、农民，就是参加58—59年实际生产不多的我们这些青年学生中间，提起大跃进，心中就有些惶惶然，提起人民公社，就想起那种极度混乱的情况。从理论上讲，大跃进、人民公社在中国是完全应该有的，谁不想中国早日富强，谁不想中国早日进入社会主义。然而如果像前几年的大跃进、人民公社，最好还是不实行的好，我认为三面红旗已大体失去人心，要举起来，是有困难的了，不过总路线这一面旗帜，还可以更多的举起来，其它两面旗帜如果换换招牌，或者不经过相当的努力，反复的宣传，要举起来难极了”。

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转抄的《千刀万剐吴芝圃》大字报和党言川1962年的私人信件，成了党言川“反党反社会主义”、“反对三面红旗”的“铁证”。刘建勋和河南省委代理第一书记文敏生和其他省委领导对党言川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文敏生在9月5日的“炮打省委司令部煽风点火大会上”曾说“你们的大会，风煽得好，火点得好，我坚持支持你们”，而在次日省委召集的常委会上，当有人提出郑大联委《火急呼吁书》有攻击三面红旗问题时，文敏生说，对郑大联委要采取明支持，暗瓦解的原则。“表面上应付它，暗地里慢慢压垮它”“我看党言川不是个好东西”。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战斗师也抓住这些“铁证”，向郑大联委和党言川发动了总攻击，声讨党言川的传单散发全省乃至全国，连边远的桂林也召开万人大会“声讨党言川一伙的罪行”。九月七日，郑大校文革和郑大红卫兵针锋相对地发出《全省人民紧急动员起来，炮打河南省“司令部”里的资产阶级当权派》的呼吁书。呼吁书中说：“我省五千万勤劳、勇敢的革命人民，在党中央和毛主席英明正确的领导下，尤其是从一九五八年以来，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光辉照耀下，取得了伟大的成绩。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在省委‘司令部’中也有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也有牛鬼蛇神，他们把持了一些部门。”“把省委内部所有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一切牛鬼蛇神统统揪出来，统统地斗倒斗垮！黎庭扫穴、斩草除根，使之断子绝孙、万劫不复！”……。在这种情况下，郑大联委于九月二十五日又发出了《关于九月三日〈火急呼吁书〉的声明》。声明中说：《呼吁书》中出现某些言词偏激，对河南存在问题的某些提法不当，“我们虚心接受批评”。我们发出呼吁书的目的，是为了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是为了炮轰河南省委中的一小撮走资派。因此，我们认为，起草的这个《火急呼吁书》大方向是正确的。”不彻底改变河南一穷二白的面貌我们死不瞑目“。九月十九日，郑大联委再次召开“揭发批判赵××、杨××大会”，并公布了《把赵××的反动嘴脸拿出来示众》的系统材料。在强大的攻势下赵××、杨××、基本靠边站了。

六七年元月，郑大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又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的极“左”倾向、饿死数十万人的滔天罪行的大方向，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

然而，到了六七年二月，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革命后，风云突变，郑大联委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党言川等被捕入狱，材料被抄走，吴芝圃也被军区保护起来。

一月二十二日，以清华大学学生唐伟为首的“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写出了《二十七个为什么——刘建勋是什么人》的文章，在郑州大量印发、张贴。文中说：为什么省委揪出来的全是吴芝圃的老班底，而刘建勋带来的班子却纹风未动？为什么不去批判反动路线却先翻59、60年老帐？为什么在河南很多单位造反派阵线不清？……。一月二十三日，河南省军区介入文化大革命后，把《二十七个为什么》奉若神明，两次登在《郑州晚报》上。并把打倒不打倒刘建勋，对待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的态度是支持还是反对作为衡量是否左派的标准。三月六日，在郑州市体育场召开的由河南省驻军和“河南造总”、“十大总部”数万人参加的“省会彻底粉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新反扑誓师大会”上，清华井冈山驻郑联络站代表唐×发了言。正是在这个大会上，河南省军区第二政委何运洪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必须立即解散，停止一切活动”，“郑大联委中的一小撮头头，必须向河南人民低头认罪，必须交待他们的幕后策

划人”。会后用飞机在全省散发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的《告全省人民书》。这就是“飞机撒传单、气死党言川”的由来。军区的介入，使已经被造反派批判靠边站的赵××兴高采烈，多次给军区写信，说何运洪的讲话是“极其重要的文献”“大长了无产阶级志气，大灭了保皇派威风”“大破了资产阶级控制，真正出现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大民主”“你们干得好！你们要干到底！”。而以郑大联委为首的造反派却遭到残酷的镇压。这就是被河南省造反派称之为的“二月黑风”。

六七年三月八日，河南省公安公社和郑州市公安局派员进驻郑州大学，在郑大东生活区树起了“非法组织郑大联委骨干分子登记站”的大牌子，勒令二百多名联委成员前往登记，投案自首，交待罪恶，四十八小时内写出像样的检查。在化学系，联委成员必须填写“非法郑大联委成员罪恶登记表”；历史系50名联委成员中3人被捕，10人被公安局勒令登记，38人被斗，102人次被搜查，大字报点名40—50人，写检查113份，4340页。在斗争中，让这些学生低头、弯腰、翻戴帽，并对他们高喊：“坚决镇压反革命分子”、“只许左派造反不许右派翻天”！40多名联委学生被投入监狱。三月九日，党言川在商丘被捕，接着开封师院八二四陈红兵、郑棉六厂工人赤卫队申茂功被捕。为了摧垮二七公社，使之不能参加北京谈判，军区支持“十大总部”、“河南造总”多次挑起武斗，制造了“五、四”、“五、二六”、“五、卅”、“七、一六”等骇人听闻的攻打、围剿二七派的武装流血事件，使二七公社派群众伤残数百人，死亡数十人。当时郑州大学文科楼前成了安葬二七死亡人员的墓地（50多座坟墓文革后被毁）。

对于这段历史，河南省军区在67年6月27日给中央的检查报告中说：我们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打击了郑大联委与河南二七公社革命造反派；错误地把刘建勋、纪登奎同志当成走资派，把他们支持的造反派组织看成是“御用工具”；“在三月六日宣布郑大联委为非法组织以后，造成连锁反应，全省各地宣布解散了许多革命群众组织，错抓了许多人……党言川同学也被拘留和游了街；社会上一度出现了肃清二七公社的“流毒”，让革命群众挂黑牌、请罪的错误倾向；这时，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也乘机兴风作浪，操纵保守组织，进行打击报复，打击造反派，掀起了一股资本主义复辟的反革命逆流……。军区的检查报告，白纸黑字，是非曲直，明明白白。

毛泽东说过：文化革命中两派的群众都是革命的，以上特点的分析足以说明此论断的正确。1959年前后，发生在河南省的“信阳事件”，骇人听闻、震惊全国。虽然历史已有定论，吴芝圃曾在检查中承认“我欠河南五千万人民的债一辈子也还不清”，饱受其害的河南人民对此记忆犹新，耿耿于怀。党言川等在毛泽东“炮打司令部”的号召下旧事重提，清算这段罪行，也是情有可原的。十八岁的党言川，受河南省1959年现状的影响，对三面红旗发表了一些糊涂认识也是可以谅解的。而大跃进、人民公社化中也确实犯有“左”倾错误。党言川和同学在私人信件中谈论这些问题说明他们能够关心国家大事，是政治觉悟高的表现。文革中借此给党言川扣上“反对三面红旗”“反动学生”的帽子是错误的。说“三面红旗倒了两个”自然坚决不答应！1966年10月6日，郑州大学“送瘟神”战斗队的一分传单中说：《火急呼吁书》中说河南省多年来搞的不像样子，公然攻击三面红旗，“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河南，一个三面红旗光辉照耀下的河南，一个居住五千万革命群众的河南，竟被他们骂成这个样子！”“他们还公然煽动要大闹河南省委，要闹个天翻地覆，闹得越乱越好，请同志们用毛泽东思想来鉴别一下，这到底是哪家的声音？”一份批判党言川的“反动信件”的传单中这样写道：我们认为这封信，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毒箭。党言川在这封信里不但恶毒的攻击了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否定了一九五八年以来我国人民在最敬爱的领袖毛主席英明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有人说，这封信是党言川在一九六二年写的。言外之意似乎可以原谅。我们说，正因为是一九六二年写的，十八岁的党言川就有着如此系统，如此反动的观点，更应当引起我们的深思。”从这些批判党言川的言辞中，不难看出他们对党对毛主席一腔赤诚。当时，刘建勋、文敏生、纪登奎等省委领导也认为郑大联委的《火急呼吁书》和党言川的信有一定的错误。1

1969年6月1日，毛主席在郑州的专列上接见刘建勋、纪登奎时问：“你们不是支持被打成反革命的哪一派吗？支持的是对的么！党言川怎样？”刘建勋回答说：“他是省委委员（应是常委——作者注），表现不太好，我们批评帮助他，他给中央写了一个检讨”。据说这个检讨是党言川参加省委常委时写的，内容就是对三面红旗的看法问题。

四

在清算文革的“揭批查”运动中，曾经在河南搞左倾蛮乾造成“信阳事件”者重新掌权，又挥起“极左”大棒，大搞派性清查，造成严重扩大化。这也是河南的一大特点。

文革结束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揭发批判林彪、“四人帮”的罪行、清查文革中与林彪、“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清查各派群众组织中的“三种人”的“揭批查”群众运动。河南省在这次“揭批查”运动中，采取“依靠一派、清查另一派”的土政策，实行以人划线，以时间划线，人人检查、层层过关。农村搞到生产队，工厂搞到车间班组，机关到公务员、炊事员，街道办事处也要揪出“帮毛羽”，有的地方竟提出“提浆糊桶的也不能放过”。从1977年到1983年，历时七年，处理二七公社派和支持过二七公社派的干部五万多人，取消党员资格十万六千人，逮捕判刑1700人，又“突击判刑”2400人，（以上均为官方数字），加上亲属子女因受株连而被审查处理、不提工资、不评技术职称等不计其数。例如一个焦作市，判刑96人，却抓了318人，劳教37人，抓一两年放的185人，死亡11人。一段时间内，全省各监狱中关押的“文革罪”犯近半数以上，使文革中参加“二七公社”派的人人人自危。

派性清查是河南省揭批查的突出特点。在清查中，按时间划线，把“7、25”中央表态说成是刘建勋等人制造的大假案。把二七公社派和支持二七公社后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视为清查对象。而把“7、25”以前在军区支持下掌权的省委造总、河造总、十大总部视为正确派，不仅不清查反而被重用，一些武斗指挥者，还掌握清查工作的大权。当时省委一位副书记在一次研究揭批查问题的会议上说：“二七公社一派大小头头的错误和罪行，你们说这件事落实不了，那件事找不到证据，这样下去怎么行呢？要是这件事抓不住，就从另一件事抓住它，我不相信抓不住一条，抓住一条就可以定案处理。”这是派性清查和制造冤假案的自供词。

派性清查在全省有着普遍性。例如确山县，文革期间，两派武斗，双方各自被打死打伤二十余人，但在清查中，只清查了一派，处理了一百多人，其中判刑2人，死刑1人。而另一派一个也没有处理，主要头头、武斗指挥者，反而被提拔为县委负责人。

1984年，北京几家报社记者向中央纪律监察委员会、中央整党指导委员会反映了在郑州发现的省委造总、十大总部文革期间夺省市委权、策划武斗的会议纪录（因为是埋藏后挖出来的，故称为“出土文物”）。这个“出土文物”记载的他们一些头面人物的活动情况，是他们策划、挑动、指挥河南大型武斗的铁证。1967年7月25日以前，郑州的几次大型武斗，如冲击二七派绝食会场，围攻火烧郑棉六厂大楼，挑动郑纺机武斗等，不仅当时群众有目共睹，而且如今“出土文物”铁证如山，而他们却把打砸抢的罪名都加在二七公社派头上，真正的打砸抢头头不仅不清查，还被提拔重用，甚至掌握揭批查大权。群众说：河南的揭批查是：一派升天，一派坐监。

河南“揭批查”中，老干部被批判、审查、处理的很多，（包括红军时代和抗日战争早期参加革命的老同志），这是河南揭批查的第二个特点。

文革初期，由于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公开表态支持造反派，河南省站出来支持造反派并参加三结合的老干部比较多、比较早。揭批查中，以人划线，把文革中支持“河南造总”并代表

河造总参加三结合、十年始终居省委主要领导岗位上的戴苏理封为一贯正确，并让他领导全省的揭批查。凡跟着他支持河造总和十大总部的干部都是正确的，支持二七公社的统统打下去。1983年11月，省委付书记××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的“书面发言”中说：“随着揭批查运动的开展，对各级领导班子进行了较彻底的整顿和清理。”“对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中的三种人”和犯有多种错误的人，共立案审查4248名。截止目前（九月份）已处理4020名，其中判刑51人，受各种处份的2025人（开除党籍323人，留党察看493人，警告、严重警告347人，开除公职20人，开除留用140人，其它处份250人）；免于刑事处份的2020人，不结论不处份的107人。河南省共有省、地（市）县三级领导班子135人，立案审查和处理数量之大、之重是相当惊人的，而实际处份的数量远无止此数。所谓“免于处份”的二千多人，是审查批判后降职下放，是不处份的处份。省委宣传部的李海英同志，1954年就调到宣传部工作，因文革中参加了二七公社受审查，1983年审查结束后，被告知她没有什么问题，免于处份，被下放到商丘县工作。当时，她身患重病，让儿子替她去报了到。后来商丘县以级别高、无法安排为理由将她的关系档案退回了省委，而省委组织部说没有收到。就这样，一个建国前就参加工作的老同志至今没有了单位，工资没人发，看病无人管，多次找省委反映也无人问津，97年6月，她在省委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也被扒掉，七十多岁疾病缠身的李海英同志只是希望别人住上宽敞的新房后，腾出的旧房能给她作为凄身之地，也就心满意足了。这就是一个“免于处份”的老同志真真实实的遭遇。

省委常委中地方干部14人，清查、批判、处理十人，占67%，其中，判刑3人，留党察看1人，撤职1人，严重警告2人，在审查批判“监护”期间死亡1人，上报处份、未获批准、强令离休1人；原省委、省革委各部正副部长级干部33人，清查、批判、处理22人，占三分之二。其中判刑4人，开除党籍3人，留党察看2人，撤职6人，严重警告1人，批判后离休4人，降职安排2人；全省十八个地市委第一书记全部受到批判处份。地市委正副书记118人（缺焦作），批判处份97人，占82、3%。其中，审查批判期间死亡7人，判刑17人，开除党籍4人，留党察看9人，撤职18人，严重警告4人，批判后令其休息28人，降职下放10人，省直各厅、局委第一把手，除5人外，其余全部受到批判处理，分别给予撤职、警告、免职不用等处理；原县委第一把手中，大部份被审查批判处理，未受审查，保留原职的了了无几。

原兰考县县委书记张钦礼同志，曾是焦裕禄生前战友，在兰考工作几十年，兢兢业业，廉洁奉公，为改变兰考面貌做过重大贡献，群众有口皆碑。揭批查中，竟以“策动”兰考县文化大革命、“编造”焦裕禄事迹、“扒开”黄河大堤（实为堤内生产堤）而判刑十三年。

原洛阳地委书记孙腾芳，在洛阳地、市联合召开的十万人宣判大会上，以所谓“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罪名判十年徒刑。以这样“莫须有”的罪名被处理的，仅洛阳地委领导就有六人，还有一批县委和基层干部。当时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就明确告诉纪登奎，“什么洛阳地委组织反革命政变，准备上山打游击的问题，是根本没有的”。但中央领导人的指示到河南行不通，这批无辜的同志仍然饱受牢狱之苦，直到今天，问题仍未解决，孙腾芳刑满释放后没有了工作，且年老体衰，其爱人郝志华所在单位也破产了，孩子们因受牵连也没有安排好，造成生活极度困难，98年初，郝志华病重无钱住院医治，孙腾芳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老伴死在家里。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许多。

河南省揭批查还有一个视法律为儿戏的典刑——“突击判刑”。1979年底，河南省省委书记赵××等人，为避免《刑法》、《刑事诉讼法》于1980年元月1日生效后，他们的行动被束缚，就赶在新《刑法》生效前夕，紧急布置各级政法部门对揭批查中关押起来的人，不管有没有罪行，均以清理积案为名，大搞“突击判刑”。为了防止关押人员向最高法院上诉，把终审权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把本应由高级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地、市法院判决；把地、

市法院审理的案子，强行压给县、区法院判决。“突击判刑”秘密进行，不准开庭，有的判三年，实际上已经关押了三年多了。平顶山市委副书记钮保华判刑8年，本人不服提出上诉，市委某主管领导大笔一挥，在“8”字前加个“1”字，改为18年。这种做法在古今中外历史上也是少见的！

河南省的造反派头头，几乎都被判以重刑。开封师范学院学生陈红兵，在1967年2月，曾被抓进监狱，甚至欲判死刑。在中央解决河南问题时，周恩来指示要河南把陈红兵送到北京，并亲自接见。而在揭批查中，却把开封地区文革中武斗责任都加在他的头上，判处20年徒刑，还剥夺政治权利5年。

大量事实说明，河南省的派性清查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造成的后果是严重的。它会像当年的“信阳事件”一样，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今天，文革已成为历史。对于以上河南文革这段历史的分析是否准确，还有待研究。

□ 1998年12月初稿，2000年8月修改

~~~~~

#### 【思潮评析】

#### “血统论”在文革中的兴衰

• 史会来·刘 晓 •

分析和研究中国当代意识形态是一件吃力但很有意义的工作。十年文化大革命，是中国当代史上的非常时期，与社会政治经济动乱相对应的是各种理论和思潮的频繁更替。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考察，发动和指导这场运动的主要理论观点已得到很多的研究，而某些在这场内乱中一度颇有影响的思潮，尚未引起人们更多的关注。文革初期“血统论”的出现及其泛滥，曾给社会罩上了一层偏激和混乱的色彩。对它的兴衰进行评述，将有助于对文革的研究。

1966年7月29日，在红卫兵运动的风潮中，北京航空学院附中的出身干部家庭的学生贴出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下联是“老子反动儿混蛋”，横批是“基本如此”。这副对联的出现表明“血统论”开始在青年学生中间弥漫。

文化大革命起初是以大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为号召的。当“血统论”这一明显带有封建传统的，将政治的不平等绝对化永久化的思想意识，以维护革命的面目出现时，立即引起了人们的不同看法，产生了意见分歧，贴出上述对联的北航附中，很快形成了支持与反对的两大派。8月1日，这副对联贴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首都主要高校，在学中普遍引起激烈辩论，并导致了明显的对立。青年学生在亢奋的造反情绪支配下，辩论通宵达旦。学生之间的争论以及日渐明显的分裂趋势，对当时斗争的大方向中的偏离，是中央文革小组所不愿看到的，“血统论”的错误也不言自明，因此，8月2日凌晨，中央文革小组顾问陈伯达接见了辩论双方的代表。他明确指出“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对联是“不全面”的，建议改为“父母革命儿接班，父母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

但是，陈伯达的表态并没有能够解决问题。当日下午，狂热的对联支持者、北航附中近千名学生到清华大学游行，高呼“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基本如此！”的口号，“血统论”在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得到进一步的宣扬。受此影响，一些青年学生开始酝酿成立“工农



革干子弟协会”，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学校，掀起了组织“贫协”的风潮。北京一些到外地进行革命串联的学生，外地陆续到京串联学习的学生也将“血统论”在更大范围扩散开来。

在毛泽东支持青年学生造反的形势下，那些家庭出身好，有着优越政治背景条件的学生，充满了神圣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血统论”恰恰迎合了他们的狭隘思想的要求和偏激的革命情绪，成为青年学生中有代表性的一种思想意识。为保持文化大革命的既定目标，中央文革继陈伯达之后，试图对“血统论”加以阻止。8月4日，江青在北大指出：“我怀疑又有什么人在叫你们上当了。”第二天，周恩来也在清华大学表态时说，组织所谓贫协，不是我们党在学校的政策。有关方面的表态，使对“血统论”持异议的学生受到鼓舞，但未能制止部份学生对“血统论”的拥护和接受，争论进一步展开。

8月6日，北京中学生在天桥剧场召开辩论对联大会。中央文革小组康生、江青等人参加了辩论会。支持“血统论”的红卫兵占据讲台，将“血统论”充份地加以发挥。经过天桥辩论，“血统论”冲击到社会，加之狂飚时期社会深刻变动的的影响，社会时尚一时也随之有所改变。褪色的旧军装、宽大的军用皮带流行起来，成为青年学生羡慕和追求的装束。高挽袖口、革命式的生硬口气成为革命的风范。这些构成了“血统论”弥漫于社会的文化象征。

社会意识的流行，还必须借助于理论的翅膀。8月12日，北京工业大学学生谭力夫与别人联名贴出《从对联谈起》的大字报，就是在理论上鼓吹“血统论”的“力作”。大字报论述了“血统论”的合理性，提出要把“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作为“全面的”、“策略的”的党的阶级路线来实行，要使之“提炼为政策，上升为本本条条。”接着，8月20日谭力夫又在北京工业大学辩论工作组和阶级路线时作了讲话。讲话内容宠杂，仍刻意宣扬了“血统论”，主张对“黑七类子女要七斗、八斗，斗得背叛了家庭，然后才可能团结”。

谭力夫的思想观点，很快风靡了北京，也流传到外地。“血统论”助长了一批青年学生造反的锐气，赋予了他们理直气壮地去斗批改，充当革命先锋的责任感。正如清华附中的红卫兵8月27日在一份通告中自豪宣称的那样：“以红五类子弟为核心和主体的‘红卫兵’、‘红旗兵’组织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文化革命的先锋队”，“工农子弟立场最坚定，阶级感情最鲜明，最朴实。革干子弟政治嗅觉敏锐，闯劲儿最足。”广大青少年被作为革命主力而发动，成为加剧文革初期社会动荡混乱的一个突出的因素。在“血统论”冲击下，非“红五类”出身的学生政治上受到严重的歧视和压制，被斥之为“狗崽子”，剥夺了戴毛主席像章、唱毛主席语录歌，参加红卫兵组织的权利。在社会上，有些地区上火车、汽车要自报家庭出身，进旅店、上医院也要区分成份高低。在“血统论”影响下的破四旧行动中，北京首先开始了批斗、殴打地富坏右分子的浪潮，北京的中学、大学和一些公共场所，皮带的抽打声和人们的怒斥声不绝于耳。据统计，1966年8、9月间，仅北京市就打死1000多人。8月27日至9月1日，大兴县的13个公社、48个大队，先后致死“四类分子”及其家属325人，其中年龄最大的80岁，最小的仅出生38天，22户人家死绝。“血统论”在全国导引了多少人间的闹剧和悲剧！

“血统论”有号召和动员部份青年学生起来造反，适合文革发动的作用，然而它在理论上的粗陋和荒谬又是十分明显的，尤其是它的散播不仅导致学生之间的公开分歧和对立，而且势必要转移文革的既定目标——打倒一大批所谓“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因为这些人显然是不能用“血统论”加以区别的。

陈伯达、江青等人从一开始就不赞成“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提法，文化大革命的宣传者和组织者也不可能认可这种观点。当“血统论”的思想意识肆虐之际，中央文革进一步加以制止。10月16日，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作了《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讲话，对“血统论”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指出，“各地流行着一种所谓‘自来

红’的谬论。制造这种谬论的人，就是过去用各种手段打击、排斥工农子女的人。他们利用工农出身青少年的阶级感情，利用一部份年轻人天真提出的‘老子英雄儿好汉’来蛊惑一批学生。实际上，这是剥削阶级的反动的血统论。封建地主阶级宣扬什么‘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就是这样的血统论。这是彻头彻尾反马思列宁主义的。反毛泽东思想的，是彻头彻尾的反动的历史唯心主义，是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阶级分析根本对立的”。“制造这类观点的人，是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制造混乱，蒙蔽青年。”

陈伯达反对联动对“血统论”的分析批判，并不能说是错误的，问题是他未能也不可能揭示了“血统论”作为封建意识的沉渣重新泛起的现实原因，他反对“血统论”的目的主要在于要打倒一大批党政军领导干部，保证文革既定目标不受干扰，顺利实现。

在中央文革的政治压力下，受“血统论”影响的红卫兵产生了一种深刻的危机感，他们迅速地做出了反弹。1966年12月，北大附中、清华附中、八一学校等老红卫兵，主要是那些率先起来响应文化大革命的高干子弟，酝酿成立了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简称联动。这是一个具有浓厚“血统论”色彩的组织。12月5日，联动成员邹建平等人在西直门城楼上贴出巨幅标语：“中央文革把我们逼上梁山，我们不得不反！”这批在文革中起过先锋作用的红卫兵，自恃良好的家庭背景，认为“血统就是无比高贵”，一向自命不凡，绝不会赞同文章的锋芒指向自己赖以骄傲和完全依靠的前辈，抽掉他们美好前程的基石，为此，他们不惜与中央文革分庭抗礼。12月26日，联动在北京展览馆召开大会，号召人们“反对纵容、支持、鼓励反革军、革干子弟的行为！”“反对乱揪革命老前辈！”会后，联动成员在北京广为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江青太狂了”、“打一打关锋、戚本禹，吓一吓陈伯达”、“踢开中央文革”。

1967年1月1日，部份联动成员以中共中央、中共北京市委革干子弟，国务院、人大常委会革干子弟，中国人民解放军师、将、校革干子弟，中共中央军委、国防部革干子弟，十六省市委革干子弟联合委员会名义发布通告。通告指出：“联合行动委员会的任务：1．坚决、彻底、全面、乾净地粉碎中共中央委员会二个主席几个委员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取消一切专制制度，召开中共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保证民主集中制在党的生活中得到坚决的贯彻，保证中共、各级党委、党员的生命安全。2．坚决地全力以赴地打击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产生的各种反动造反组织。3．坚决地肃清中央党内和国家机关的反党分子、蒋介石分子、赫鲁晓夫分子。4．巩固三面红旗，加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建设和无产阶级专政。5．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联合行动委员会号召各省市革命干部子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忠于马列主义和1960年以前的毛泽东思想，树立共产主义世界观，继承革命传统，在各地迅速组织联合行动委员会。”这里，我们并不需要对联动的所有主张作出评述，从所录的内容来看，它至少表明联动已对文革的发动者、文革的指导路线和文革的打击对象产生了严重不满，对毛泽东晚年思想表示了怀疑。显然，在“血统论”思想意识引导下的这批偏激的青年学生，已经走到了同当时党的领导、同党的路线明显对立的地步。如果说“血统论”起初还只是一种应当批判否定的社会思潮，那么，联动的出现则把它转变成了给文革发展造成威胁的实际政治行动，其命运必然不会美妙。

联动成为中央文革决意打击取缔的对象。1967年1月17日，谢富治指示公安部：“要保护左派，反击右派，镇压反革命。例如‘联合行动委员会’、‘西安红色恐怖队’这些组织是反动的，头头是反革命”。当日开始，公安局在“造反派”群众的配合下，逮捕联动成员。“造反派”群众还摧毁了设在北京一〇一中学、北京工业学院附中、北京石油学院附中、人大附中、北大附中、十一学校、八一学校的联动据点。2月3日，《红旗》杂志发表社论《论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夺权斗争》，将“无产阶级革命派向党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夺权”斗争，与联动问题联系起来，指出联动等组织是“走资派”反夺权斗争的工具，“这种反动组织，有的就是在顽固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指挥下进行反革命活动的。”这样，便在组织上和政治上宣

判了联动的死刑。与此同时，随着一大批党政领导干部被批斗和夺权斗争的开始，也在事实上无情地宣告了“血统论”的彻底破产。这种曾一度活跃在部份青年学生之中的思想意识很快淹没在新的理论喧嚣之中。它使一批“根红苗正”的决意要革别人命的青年学生第一次尝到了被革命的滋味。

“血统论”的兴衰是暂短的，对于经历过十年文革的人来说，它并没有给人们留下太多的印象，这一方面是由于文革的波澜起伏，对社会的震荡和破坏太大太多的缘故，另一方面在于这种带有浓厚封建色彩的思想意识，在当时也未能取得广大青年学生和社会上大多数人的赞同。它之所以能在文革中显露一时，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文革本身就是一个极大的悖论。历史上的事件，很少象十年文革这样为手段和目标之间如此严重的不协调所折磨，为动机和结果之间如此巨大的差异所毁坏。这场革命以大破四旧为号召，以改变人民的思想使之革命化为重要目标，却导致“血统论”的复归和其他封建意识的盛行。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家，文化传统既有光辉灿烂的一面，也有消极落后的糟粕。文革中出现的“血统论”并非什么新东西，它是在革命的名号下出现和泛滥的中国封建传统的沉渣，是宗桃继承、家族制、世袭制，“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在气候适宜时的浮现。“血统论”是将政治的不平等永久化的意识，它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的观点格格不入。

“血统论”的泛起，除历史上封建传统的影响而外，主要的则在于它有着阶级斗争渗入整个社会生活的基础，有着长期以来阶级路线重视“有成份论”的基础。建国以后，阶级观点逐步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重视以家庭成份、家庭出身来划定阶级队伍，造成了世代以血统延续的阶级阵线。出身于革干、军人、工人、贫下中农家庭的青少年，被视为“根红苗正”的依靠对象，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或者在历史上有各种问题的人，即使个人思想政治表现再好，也往往被认为是不可靠的。这就导致社会生活各方面，诸如上学、就业、婚姻、参军、入党、提乾等问题的不平等，形成了一部份人的优越感和另一个部份人处于受歧视和被压抑的地位。阶级斗争扩大化的影响和政治运动的频繁开展，使以血统延续而划分的阶级阵线更加分明。这就很容易使青少年萌生家庭出身决定命运的观念。家庭出身好的人发生“自来红”心态，那些出身于高、中级干部家庭、军队干部家庭的子女，由于其特殊的生活环境和成长途径，更容易滋生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自认为是继承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天然而可靠的接班人，从而轻视、排斥甚至打击其他家庭出身不好的人。

长期以来存在的这种思想意识，之所以在文革期间能够迅速蔓延，一时成为有影响的风潮，从根本来说离不开文化大革命的特有目标和它发动的特殊方式。十六条指出文革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造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这种宽泛而不切实际的政治目标，以及它将矛头指向党内一大批领导干部和推翻现有一切秩序的凶猛来势，使以往所有的政治运动都黯然失色了。党和人民很难理解和把握，只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充份信赖和凭借以往的政治经验，努力去紧跟这个大方向。面对这场难以预测的政治大风暴，人们往往表现的保守而犹豫不前，就是那些阅历丰富居于领导岗位的人也感到茫然无措，这就很自然的把那些年少气盛、从未经历过政治风雨的革命后代推到了前台，客观形势赋予了他们的政治优越感和充当革命先锋的有利时机。他们崭露头角的前提是原本拥有的优越的政治背景和自然条件，于是“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个古老而陌生的观念，便成了最能体现他们的偏激之情，又自认为最为革命的钟爱之物。文化大革命是通过自下而上，抛开现有的各级组织，用“大民主”的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开辟道路的。这种特殊的方式否认除毛泽东及其思想而外的任何权威。但是，在这批“革命小将”的眼里作为他们根基的那个阶层的地位和利益却丝毫不能动摇。谭力夫当年在宣扬“血统论”的时候，

斥责那些狂热揪斗党的领导干部的学生：“共产党的干部犯错误，你们高兴什么？”联动的通告也声言要“保卫党的各级组织和优秀、忠实、英勇的领导干部”，正是表现了他们的这种情绪。应当说，文革期间的“血统论”同历史上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维护其等级和利益的一种工具并无本质上的区别。“血统论”的信奉者敢于表达不赞同文革锋芒指向党的领导干部的看法，并非是他们从根本上觉悟到文革的错误，而是他们在长期的“左”的环境熏陶下形成的政治优越感的本能反映。在社会平稳发展的时候，政治秩序一般是稳定的，“血统论”意识往往为既定的现实差别所遮掩，似乎并不需要人们在观念上给予格外的强调。只有当社会激烈变动的非常时期，它才会顽强地表现自己，而不管社会究竟给予多少认可。

“血统论”不存丝毫的理论上的正确性，它作为文化大革命发动的伴生物而泛起，初期曾迎合了文革发动者实行“造反”的一定需要。然而，当它成为实现文革既定目标的障碍时，必定要遭受被打击的命运。应当指出，就是在“血统论”风行之时，尚未对文革造成威胁之际，也并非为社会大多数人所接受，毕竟它的封建印记太明显，人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教育下已有了相当的识别能力。加之当时社会上存在的某些特权和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已为广大群众包括青年在内的群众所不满，他们对“血统论”的反感和抵制便成为使之迅速衰败的重要社会原因。

□ 来源：《龙江党史》1994 / 03

---

|                       |             |          |
|-----------------------|-------------|----------|
| 本期编辑：                 | 《华夏文摘》执行编辑： | 《CND》总编： |
| 华新民（美国）               | 吕青（加拿大）     | 熊波（美国）   |
|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             |          |

投稿专用地址：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